



陈伯达

# 中國農業的 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2月2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3411  
37

1956

陈 伯 达

中國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962·707×1092 1/32· $\frac{1}{2}$ 印张·9,000字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本著在京、滬、沈、港、渝五地印造）  
印数：（京）1—250,000 定价：（3）0.05元

我完全同意周恩來同志在这次會議上所作的政治報告。現在我對於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作一些補充的說明。

中國農村現在正在經歷着一次新的大革命，即社會主義革命。

1955年下半年，中國農民結束了自己在三岔路口上的搖擺不定。不僅是廣大的貧農群眾，而且還有廣大的中農群眾，他們拋棄了資本主義的道路，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根據1955年12月底的統計，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占全國總農戶數的60%以上。到今年1月底的統計，入社的農戶則已經占全國總農戶數的78%，共有9,281萬多農戶，其中屬於高級社的農戶為2,459萬戶。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中國的情況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雖然多数的合作社到今天為止，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是農民只要踏上這一步，那就是在基本上解決了個體經營和合作經營的矛盾，因而向全社會主義再進一步，已經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而且全國合作化的群眾運動已經形勢，~~便非~~把革命推進到底不可。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規定：要求各省、市、~~區、市、縣~~1956年基本上完成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達到80%左右的農戶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同時又規定：要求合~~作化地區~~且已經辦好了一批高級社的地區，在1957年基本~~完成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其餘地區，則要求在1958年基

基本上完成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根据各地方現在的進度和農民群众的热情看來，这是一个完全能够实现并且还有可能提前實現的計劃。農業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前進，使富農最后地被孤立起來，党的限制富農的政策已經轉到消滅富農作为一个階級的政策，農村的資本主义正在走向滅亡。事实的結論是：在中國共產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英明領導下，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到現在已經得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勝利。

这个社会主义性質的革命，是一个比起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要深刻得多的革命。这是最后一次挖農民窮根的革命。1943年毛澤东同志在他的著名的演講“組織起來”指出过：“在農民群众方面，几千年來都是个体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个生產單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窮苦。”在封建地主階級被推翻后，農民分了土地，但他們繼續是分散的，只要这样的状态存在下去，也就会成为資本主义統治的經濟基礎，新的剝削階級——富農就会像过去封建地主的宰割他們一样，一个一个地來吞并他們，土地必將重新集中在剝削者的手中。要避免这样的命运，那就要農民不是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是應該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再繼續革命下去；不是“各人自扫門前雪”，把自己束縛在細碎的小塊土地上，而是應該在和工人階級形成巩固的联合的条件下，進行農民本身的联合，把土地的經營有計劃地統一起來。为着說明这样一个問題，我現在引用下列兩個关于土地改革后農村中土地買賣的材料。虽然這兩個材料只是个别地区和个别鄉村的，但毫無疑义的，这是一些具有典型性質的、也即是具有普遍性質的材料。

第一，1955年12月河北省保定專區11個縣的統計材料：1949年土地買賣數量為43,890畝，1950年增加為54,494畝，1951年又增加到115,188畝。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後，1952年減為91,421畝，1953年又減為78,450畝，1954年再減為36,245畝，1955年則減到8,290畝。

第二，1955年11月吉林省扶餘縣3個村的調查材料：出賣土地的農戶，1950年有7戶，共賣出11垧；1951年有9戶，共賣出11.5垧；1952年有11戶，共賣出14垧。1953年合作化後終止了土地買賣的情況。

根據上列的兩個材料，可以看出在事實上存在這樣的規律：即使我們實現了土地改革，農民生活已經有了改善，但在合作化運動開展以前，土地的買賣是逐年增多的，其中失地的多數是貧農；但也有中農，他們並因此下降為貧農。在合作化運動開展以後，走了一個相反的方向，土地的買賣逐年減少了；在實現了基本合作化或完全合作化的地區，土地買賣就基本上停止下來或完全停止下來了。合作化運動以前和合作化運動以後的鄉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局面，而當農民已經有半數以上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時候，也就在全國範圍內根本改變了局面。

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能夠在最近短短的幾個月內，這樣迅速地卷入了極其廣大的群眾，是由於有下列的幾個主要的因素。

（一）中國農民的革命性。中國農民在長時期內受到外國帝國主義者、地主、買辦、富農的各種殘酷掠奪，大多數在實際上是半無產者。1926年毛澤東同志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指出中國的半無產階級包括了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

他們是“農村中一个数量極大的群众”。这个在農村中数量極大的半無產階級，生活驚人地窮苦，富有很大的革命性，在兩個革命中都成为農村革命的主力，并帶动了其他的農民（中農），結果使中國的農民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变成非常革命的農民。有些人总認為農民是保守的，怀疑他們能否接受社会主义。有些人承認農民的兩重性，但是在实际上也总是片面地強調了他們的保守性，而忽略了他們的革命性。有些人因为帶着这样一些对農民的成見，因而当農民已經成批結隊地加入合作社的时候，还在怀疑这种入社的農民是否可靠。总之，对于改造農民的問題有各种怀疑派。但是这些怀疑派都錯了。第一，有保守的農民，有革命的農民。如果某些國家的農民在某种条件下成为比較保守的農民，为什么像在中國这种条件下的農民不能成为非常革命的農民呢？第二，一切事物都不会是固定不变的，为什么農民的兩重性就老是不会起变化呢？为什么我們國家的政权的性質、我們偉大的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种种政治的和經濟的燦爛成就、我們國家的社会主义工業化的迅速發展——这一切条件不会給農民以強烈的影响，而使他們日益覺悟到自己的將來呢？第三，要看農民追随的是那一个階級，是資產階級还是無產階級？中國農民也曾經追随过資產階級，但結果一無所得，而在追随了無產階級之后，却得到了一連串的勝利，因此，在農民群众中就作出了一个普遍的結論：“跟共產黨走，听毛主席的話，是不会錯的”。为什么已經从事实上得出这样結論，并从而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農民群众是不可靠的呢？总之，我們必須对于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必須用辯証法的观点去观察各种事情的变化。比如关于中國民

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也應該這樣去觀察。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在它們的條件下成為非常反動的資產階級，但在原來是被壓迫民族的中國條件下的民族資產階級為什麼不可能成為革命的同盟者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樣偉大變革的環境中，在全國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影響下，民族資產階級在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所表現的兩重性為什麼不可能起變化，而終於從觀望態度轉到採取積極的態度呢？民族資產階級也曾經追隨過外國帝國主義和買辦官僚資產階級，但結果一無所得，而在追隨無產階級之後，卻看到了祖國的日益強盛和祖國的極其偉大的將來，並且經過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運動和多次思想改造運動等等的教育，他們考慮到國內外種種的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為什麼不可能最後地選擇一個對於自己比較有利的出路，也下決心跟共產黨走而準備放棄自己剝削階級的地位，準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把自己從剝削者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呢？最近在資本主義工商業中出現的公私合營的高潮，在事實上也把這些問題解答了。

（二）黨的正確的群眾路線。如大家所知道，我們對於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工人階級執政的國家政權領導下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因為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所以就可能出現兩種理解，兩種做法。一種理解，就是說，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認為這既然是自上而下的革命，那末，就用不着去認真地發動農民群眾，用不着注意農民群眾的自覺，它就可以經過單純的行政手段來實現，因此，就企圖用“恩賜”的辦法，用“官辦”的辦法，而憑他們主觀的估計，有時候採取強迫命令入社的形式，有時候也可以採取大批解散合作社的形式。另一種理解，就是

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則認為這個革命，也和一切大革命的規律一樣，它要得到勝利，必須取得群眾的擁護，必須依靠群眾的自覺，群眾的決心，群眾自己的動作，而要使農業合作化運動成為真正廣大群眾的自覺的運動，就必須用一系列的辦法，是積極地引導群眾覺悟、發動群眾的辦法，而不是消極等待和聽任群眾自流的辦法，是把必要的行政設施和群眾運動密切地互相结合起來的辦法，而不是把行政設施和群眾運動互相孤立起來的辦法。這是黨的正確的群眾路綫。毛澤東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集中了我國多年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經驗，進一步地具體化了黨歷來所執行的這個群眾路綫。毛澤東同志嚴格地批判了那成為群眾絆腳石的保守主義，同時又嚴格地和那“欲速則不達”的命令主義區別出來，而提出了以下的黨的方針：第一，必須認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準備工作；第二，應該分別農民群眾的經濟地位和覺悟程度，分批分期地加以組織起來，而首先是將經濟地位貧苦或者還不富裕的人們（約占農村人口60%到70%），按其覺悟程度，分作多批組織起來，然後再去吸收富裕中農。正是黨的這樣一個積極的、同時又是有序性的發動群眾進行組織合作社的規劃，促進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以人們所意想不到的速度前進。

（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實例日益眾多地給農民證明了它比個體經濟的巨大優越性。勞動生產率的比較正是說明了這一點。1919年列寧說過：“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條件。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徹底被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戰勝，是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勞動生產



率。这是很困难很長期的事業，但这个事实已經开始，最主要之点就在这里。”我國在土地改革之后，緊接着就展开了農業互助組的运动，这种互助組的劳动生產率已經开始表現它比个体經濟的优越性。1943年毛澤东同志在“論合作社”的演講已經指出过：“現在的陝甘寧边区的經驗，一般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二人可抵三人，模范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全國解放以后，几年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試点分布在全國，而且到1955年上半年已經有一批成片的合作化的地方（全鄉、全区、全縣，有的是全專区），这数十万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業劳动生產率不但高于一般个体農民，而且也比互助組更高，并且一直是在繼續提高着，因而能够獲得比農民个体經營以至一般互助組在当地任何时期內都要多得多的農產物，甚至能够在短时期內超过富裕中農以至富農的單位面積的產量。許多事实已經說明：農業生產合作社一經組織起來之后，只要經營得好，就能够在四、五年內，或者在比較四、五年还多一些的几年內，也有一部分甚至不要四、五年，增加一倍左右的產量。正因为為在農民中已經有了許許多多这样的活的榜樣，正因为它們提高劳动生產率的优越性鼓舞了廣大農民，毛澤东同志“关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便一下子突破了右傾保守思想的束縛，而及时地对于促進農業合作化的高潮起了極其巨大的動員作用。高級合作社对于群众的吸引力，道理也是同样。这就是：高級合作社最后抛弃了土地的私有制和其他重要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比初級社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土地、農具和牲畜，更合理地組織社員的劳动，同时，更有可能利用新式的農業技術。特別由于完全實現按勞取酬的原則，也就能够更大地發揮

農民的劳动積極性。这些因素使高級合作社的劳动生產率更高于初級合作社。因此，初級合作社發展到一定时候，將不可避免地要轉为高級合作社。只要今年一年農業丰收，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优越性就会表現得更明顯，那末，大量農民就会向更高处指望，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就將要比我們預定的計劃更早地實現。縣、区、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全面生產規劃，將促進小社并成大社，同时將促進初級社升为高級社。

我國有一億一千多万農戶。要把这样众多的分散的農戶組織到合作社內，这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但是，由于中國共產党在毛澤东同志的領導下，根据中國農民的具体条件，規定了正确的群众路綫，建立了多年的实际范例，終于在建國以來的六年時間內，說服了大多数的農民，解决了这样困难的任务。这是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一个偉大勝利。我國人民和我們世界上的朋友都為我們这一个偉大革命的成就而欢呼，这点是很可理解的。

当然，因為我們一直到現在还是一个農業國（虽然我國工業是在迅速發展着），我們現在还只是勝利地解决了和正在繼續解决着農業的社会改革的任务，農業生產合作社还只能有部分的技術改良，也有些可以使用部分的農業机械，但解决農業的技術改革的任务却必須有更多的時間。毛澤东同志在“关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著作中指出：“中國只有在社会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通通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經濟面貌全部改观。”所以，如果滿足于現在的成就，那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因此就曾經有些好心的人向我們詢問：我們在还不能实

現農業機械化的時候就實現農業合作化，這究竟是否妥當呢？關於這點，毛澤東同志在他的著作中也已經作了明確的說明：“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有了農業合作化，卻還沒有實現農業的機械化，算不算得社會主義呢？我們說：問題不是什麼算得不算得，而是事實究竟是什麼。在我們這裡，如果完成了高級的農業合作化，如果重要的生產資料是屬於公有的，合作社的人們的互相關系只是合作和互助的關係，而並沒有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這不是社會主義是什麼呢？斯大林在“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著作中曾經將蘇聯那時只是把農民原有生產工具集合在一塊耕種的初步集體農莊叫做“手工工場時期”的集體農莊，這是一個很好的比擬。人們承認資本主義有過一個手工工場的時期，為什麼社會主義的農業就不能有如像這樣的時期呢？在歷史上，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發生在產業革命之前的，其他國家也有相同的情況。為什麼我們的農業合作化的革命，不能夠產生在農業的技術革命之前呢？為什麼我們不能經過農業合作化的革命來迅速地為技術的革命開辟最廣闊的道路呢？這些道理都是可以不辯自明的。

毛澤東同志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我國農業合作化的高潮所引起的全國農業生產的高潮證明了這一點。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是我國人民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之下，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為發展農業生產力和在農業方面改造我國自然界的第一個宏偉的計劃。這是集中了我國各地區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已有的增產的經驗而訂出來的計劃。根據農業生產合作社提高勞動

生產率的可能性，根據初級合作社在一兩年內迅速轉為高級合作社、而高級合作社又有進一步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可能性，這是一個有根據的、可靠的、能夠實現的計劃。在這裡，需要說一下“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第二十三條關於提高勞動力利用率的規定：即從1956年開始，在7年內，必須做到農村中的每一個男子全勞動力每年至少做250個工作日，婦女除了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以外，在7年內，要求做到每一個農村女子全勞動力每年生產勞動的時間不少於120個工作日。此外還要求農村中一切具有半勞動力的人們或者能夠做輕微勞動的人們，都積極參加適合他們能力的勞動。無可疑地，爭取這個規定的實現，對於12年全國農業發展計劃的實現，將起極其重大的作用。由於農村中平日空閑起來的大量勞動力的充分利用，加上合作社勞動組織的日益合理化，這就使得許多比較大規模和比較精細的農業措施成為可能。因此，這就存在着超額完成12年計劃的可能性。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有兩個增產的指標，即糧食和棉花的增產的指標。糧食是農業生產的基礎，所以糧食增產的指標又是各種農作物增產的最主要的指標。“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所規定的12年糧食增產指標，主要的是依靠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有人提出所謂“地力遞減”，懷疑這種增產的可能性。所謂“土地肥力遞減律”，這是馬克思主義早已駁倒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理論”。事實最雄辯。我國多年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糧食及其他農作物不斷增產的實踐，也早已把這個腐朽不堪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理論”駁倒了。許多材料說明，合作社的農業生產一般是逐年增加的。因為各地方和各合作社的條件

不同，增產的速度并不一樣，有的因為遇到天災，也發生過年產量比前一年減少的事實，但是由於合作社有巨大的抗災能力，即使遇到某些天災，許多合作社也還是有不同程度的增產。前幾年我國出現過所謂“合作社只有三年優越性”的論調，這也是類似“地力遞減”的“理論”。但是我們有許多合作社已經辦到四年，辦到五年了，卻依然是優越性。這是說明什麼呢？這不也就是說明所謂“三年優越性”的論調已經破產了嗎？根據我們手里的一些材料，“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準備在12年內爭取達到400斤的地區，例如河北省一個420戶的全鄉合作化并組成一個合作社的饒陽縣五公鄉，每畝平均產量在1954年已經達到419斤，在1955年已經達到463斤；準備在12年內爭取達到500斤的地區，例如山東省一個680多戶的基本合作化而組成13個小型合作社的莒南縣厲寨鄉和河南省一個420多戶的基本合作化而組成11個小型合作社的信陽縣甘家沖鄉，每畝平均產量在1955年都已經達到550斤；準備在12年內爭取達到800斤的地區，例如廣東省，在1955年已經出現了一個每畝平均產量1,000斤以上的著名“千斤縣”，即潮安縣。這是從鄉和縣為單位來舉的例子。至於個別的合作社這類例子就很多了，而且有不少還更大地超過這樣的指標。例如河南輝縣孟庄村第一社，每畝平均產量在1955年已經由原來當地的200多斤達到940斤，山東即墨縣張式瑞合作社每畝平均產量在1951年是互助組時只516斤，1952年成立了合作社，到1954年即已經達到1,000多斤。這些只是個別例子。但是這些個別例子，也就是表現了農業合作化後所可能發掘的土地潛在力量。當然，“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所規定的增產指標是要經過很大

努力才能达到的。我們共產党人沒有說過要达到任何一种奋斗的目的，是不需要努力的。我們必須努力來达到以至超过这样增產的指标，而只要努力的話，也就会把我們增產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農業生產合作社多年來建立了許多关于改良土壤、提高土地肥力的榜样。这里举出載在“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部書里面的兩個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以農業劳动模范李順达而著名的山西平順縣西溝鄉。这个鄉原來是一些荒涼閉塞的山庄，童山秃嶺，耕地塊小零散，自然条件非常不好。而且因为多半是梯田坡地，边岸常被雨水冲刷，水土不易保持。但从1943年到1951年的9年当中，農民先后組成了20几个互助組，便利用節省出來的劳动力和財力，集体修边壘岸，逐漸保持水土，并且用里切外垫、整修梯田、淤灘地的办法，擴大了耕地。这山区就第一次变样了。1952年建立了合作社，先后訂了3年的、5年的、15年的計劃，規定要修灘地，修小型水庫，開山溝，把細小的泉水和雨水積蓄起來，以便使全村于旱缺水的耕地擺脫旱灾的威脅；要在山野的荒坡上，种植牧草，繁殖牲畜；要進行封山育林；……如此等等。这山区又第二次开始变样了。第二个例子是山东曲阜縣陈家庄。这个村庄处在碱河边岸，过去土地被雨水冲刷，庄稼被風沙吹打很重。办社以后，農民們利用碱河兩岸的沙灘大力植樹造林，現在已經封灘造林1,500畝，植樹7万余棵，不僅保持了水土，保护了村庄，而且有200余畝沙灘挂上了大層游土，可以耕种了。預計再过几年，就可以有大片荒灘变为良田。“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書中还載有其他的改良土壤和保持水土的許多事例，其中有一篇的

題目是：“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規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在農民个体經營的時候，存在了不能抵抗自然災害的襲击而致水土流失、削弱土地肥力的現象，但在合作化之后却能够有效地甚至在短時間內提高土地的肥力。這就是我國農業經濟的大变化。这种变化在1955年下半年以前只是个别的开端，但从1955年下半年以來，由于合作化的成就，全國農民已經成片片地为改良土壤、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加强積肥，而广泛地动员起來。随着我國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國家大規模水利的建設、農業技術改革的進行，也就更將为不断地增進土地肥力和增加農產品而創造更多的条件。列寧在批判“土地肥力遞減律”的時候，說道：“……我們以前並沒有黄金时代，原始的人是完全被生存的困难、被与自然的斗争的困难所压迫着。机器与改良的生產方法之采用，一般地使这个斗争、特別地使食物的生產对于人是不可計量地容易了。”中國農業合作化的革命使農民从个体經濟制度解放出來，結果也就使農民能够逐步地从自然的压迫中解放出來，而技術的不断改革和生產方法的不断改善將促進这后一个解放。

有些惡意的外國人散布一些所謂“中國人口太多，糧食困难，因此会進行侵略”的种种可惡的言論。現在我國也还有些人相信馬尔薩斯荒謬的“人口过剩論”。但是所謂“土地肥力遞減律”的破產，同時也就說明了馬尔薩斯的人口論的破產。按照“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准备在12年內所要達到的糧食增產指标，即比現在的糧食產量增加到一倍以上，那末，在我國至少也还可以再容納6億人口。在12年以后，当然又有更大的農業發展的远景。中國並沒有發生人口过剩，而是外國帝國主义

者、封建地主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我國解放前曾經極殘酷地破壞了中國農業的生產力。這就是事情的真相。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糧食問題對於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性。幾年來我們大家都是親身感覺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的。解決這個問題的道路是使農業的生產從個體經濟制度過渡到合作化制度。去年夏季以來，毛澤東同志從提出農業合作化問題到提出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已使我們走上了順利地解決這個問題的軌道。我們現在已經完全可以看見：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將在一個比較順利的國內條件下前進。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事業已經可以指望有一個可靠的糧食和工業原料的基地。在新的基礎上鞏固起來的工農聯盟，已經使我們偉大的人民共和國成為不可戰勝的了。

這些也就說明：為什麼農業合作化的成就會使全國人民這樣地歡欣鼓舞，而現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民提出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這個偉大的計劃，正在大大地壯大全國人民建設新中國的意志，而使我們的敵人為之垂頭喪氣。